

## 第五章 参加第五次“围剿”

### 第五次“围剿”次中朋口战役

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军在江西对红军第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蒋介石才认识到对红军作战不能固守老一套的作战方法，想依仗兵力的优势，长驱直入，一举“歼灭”红军的企图，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被迫采取修碉堡筑公路，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驻抚州（临川）；所指挥的部队计有：冷欣的第四师，姚恂的第五师，周岳的第六师，陶峙岳的第八师，萧乾的第十一师，万耀煌的第十三师，霍揆彰的第十四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冯安邦的第二十七师，王懋德的第二十八师，邹洪的第四十三师，李塹珩的第五十三师，韩汉英的第五十九师，傅仲芳的第六十七师，李生达的第七十二师，李汉章的第七十四师，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张钫的第七十六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王仲廉的第八十九师，欧震的第九十师，柏天民的第九十二师，唐云山的第九十三师，李树森第九十四师，萧致平的第九十六师，孔令恂的第九十七师，夏楚中的第九十八师，郭思演的第九十九师，郝子举的新二十师，还有几个独立旅，番号和主官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北路军总司令以下，有第三路总指挥陈诚，第六路总指挥薛岳，第二十路总指挥张钫，第二十六路总指挥孙连仲，第四军军长吴奇伟，第五军军长薛岳（兼），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第三十军军长彭振山，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第三纵队司令樊崧甫，第四纵队司

令汤恩伯等。陈诚又兼任前敌总指挥，大部分军事指挥权，实际掌握在陈诚手里。

上述这些部队，绝大部分分驻在南城、南卡、黎川、硝石、宜黄等地区，积极从事修碉堡筑公路，整补部队实力，准备进犯苏区的广昌、宁都一带。

一九三四年二月间，蒋介石亲自指挥其嫡系部队约十个师入闽，平定十九路军的“变乱”后，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驻漳州；所指挥的部队计有：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卢兴荣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陈明仁的第八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以及周志群旅等。

上述这些部队，大部分驻在闽西南的漳州、龙岩、上杭、新泉、连城一带，积极从事修碉修路，准备进犯苏区的长汀。

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驻韶关。陈济棠曾派其所属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李振球的第一师，叶肇的第二师及桂军王赞斌师，驻在赣南一带。当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 and 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很尖锐的，他们之所以派出这几个师到赣南，并不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主要是为他们自身的利害着想，目的是防堵红军进入粤桂地区。及至蒋介石讨平十九路军后，陈济棠害怕中央军乘机由闽南进入广东，乃将所属部队的大部分，驻防于梅县、兴宁、大埔、蕉岭一带，防蒋军入粤。蒋介石利用陈济棠这种疑惧心理，以重金诱陈增兵协同进攻苏区。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加派其第三军军长李扬敬，指挥李振良的第五师，黄延楨的第七师、黄质文的第八师、黄任寰的独立第一师，并附以广东空军部队的一部，集结于平远一带，向苏区的寻乌、筠门岭进攻。

蒋介石复任命何健为西路军总司令，驻宜春；所指挥的部队计有：王东原的第十五师，彭位仁的第十六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李觉的第十九师，戴岳的第四十六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

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陈渠珍的新编第二十四师，陈光中的新编第六十三师。这些部队大部分使用于湘赣边区，进攻当时在平江、浏阳、醴陵、修水、铜鼓、万载一带的红军第六军团，与蒋军对中央苏区的进犯起配合作用。

另外还有一些部队是对赣东北地区方志敏所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团作战的，部队番号及主官姓名，记不清楚了。

上面所列举的五十多个师，当时大多数都是两旅四团制，只有少数是三团制的师，每师兵力约七、八千人，加上南昌行营直接控制的一些部队，各方面军和各军所辖的炮兵、工兵、通讯、运输、警卫等部队，再加上赣、闽、粤、湘四省的保安团队，总兵力约为一百万人。

就我所知，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有部分用于对付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以外，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这也说明蒋介石是倾其全力来孤注一掷了。

故军事学家杨杰（曾任国民党政府时期陆军大学校长多年）曾讽刺陈诚是个猪头将军，就是说陈在江西对红军作战时，不了解红军的作战方法和红军的特点，总是凭匹夫之勇冒险直冲，结果弄得损兵折将。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乃于第五次“围剿”时改用修碉堡筑公路，步步为营、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顾祝同衔蒋介石之命，乘飞机由南昌飞往龙岩，因飞机发生故障，在中途被迫降落，顾和驾驶员均受了轻伤<sup>①</sup>。他们在新泉我的司令部住了一夜。那

<sup>①</sup> 顾祝同带参谋译电员各一人，分乘军用飞机三架，于九月二十日左右由南昌出发。顾乘坐的那架，由空军战斗机队队长张有谷驾驶，行至中途发生故障，被迫降落于新泉东边二十多华里的一块稻田里，整个机身翻了一半，陷入泥土中，顾和张都受了轻伤。

天晚上，因为并无他人，顾对我说过一段重要的话。他当时曾嘱咐我不要对旁人说。现把顾祝同当时所说的主要内容记述于下：

顾说：“委员长估计共军真正能作战的兵力，约为十五万人到二十万人（指中央苏区的红军而言）。至于那些校标队，只是摇旗呐喊，没有枪支，是谈不上有战斗力的。共军所占地区有限，他们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都很缺乏。如我军不再失利，他们一定不能持久下去。委员长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福建事变的迅速平定，把十九路军消灭得这样彻底，是始料所不及的。这个问题的迅速解决，扭转了整个局势。我军的有力部队进驻闽西，和北路军联成一气，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而且缩小了对共军的包围圈，这一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现我军把重兵放在北路和东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先攻下宁都、长汀，然后再进取瑞金、兴国，压迫共军于赣江而消灭之。这是我们的作战目的。但委员长估计到我军压力过大，共军招架不住时，可能逃窜。他们这样多的人，想从赣江下游渡江西窜的可能性不大，唯一的就是从赣南窜入广东。委员长认为如万一共军窜往广东，我们一定能消灭它。因为共军离开根据地，到了广东，东临大海，活动的范围缩小了。陈济棠为了他自身利益，必然会拼命打，中央大军几十个师跟着进入广东，共军主力就很难生存了。现两广和中央处于对立的状态，阻碍国家的统一，这是使中央最头痛的。如共军入粤，我们大部队跟着进去，不仅可消灭共军，也可迫使陈济棠就范，岂不是一箭双雕吗？广东问题一解决，广西的李、白就孤立了，将来也比较容易解决。至于其他地方军阀，力量都不大，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号召力，是不敢与中央抗衡的。这样就可完成国家的统

一。”

从顾祝同这段谈话，可以充分看出当时蒋介石的战略着眼和所打的如意算盘。

福建事变平定后，蒋鼎文的东路军总司令部驻漳州。所辖部队驻地如下：第九师驻漳州附近；第十师驻龙岩、永定、上杭一带；第八十三师先驻在龙岩西北地区，以后开驻连城；第三师原也驻在漳州附近，到五月间曾一度调往江西的黎川，随后又从黎川调到连城一带；第三十六师驻在晋江、惠安一带，到七月间经漳州、龙岩开驻龙岩、连城间的新泉一带；第八十师驻在沙县；第八十七师驻在福州附近。至于刘和鼎的部队，则仍驻在闽北地区。先是汤恩伯指挥的第四、第八十九两师，曾由江西开入闽西的永安附近，福建事变解决后，这两师又调回赣闽边境的建宁一带，改归北路军指挥，于是年九月间进攻石城。驻在闽西南的几个师，自五月至八月，主要任务就是修筑碉堡和公路（主要是龙岩至新泉、朋口的公路），并对红军严密警戒。

九月初，东路军奉蒋介石命令担任进攻长汀的任务（北路军进攻宁都、石城地区）。蒋鼎文根据命令所给予的任务，策定的部署概略如下：

（一）兵力不详的共军（估计为一、二万人），其主力在朋口以西白衣洋岭一带高地占领阵地，构筑了相当强固的工事，企图阻止我军进攻长汀；其一部在上杭、新泉间活动，企图相机扰袭我左侧背，另一部在连城以西地区活动。（二）东路军以击破朋口以西一带高地共军主力后进取长汀为目的，决定先将主力集结于朋口南北地区，待命开始进攻。

到九月十五天左右，各部队集结的情形大略如下：第三师，朋口以西地区；第九师，朋口以东地区；第三十六师，新泉附近地区；第十师，龙岩至新泉间地区；第八十三师，朋口、连城间地区；第八十师由沙县经永安推进到龙岩附近；炮兵第五团第一营，朋口附近；汽车兵团运送大量炮弹及各种弹药器材到朋口中

屋村(在朋口东面)一带存放；东路军总司令部由漳州移驻龙岩。

大约就在这时，蒋鼎文由龙岩来到中屋村，召集营长以上干部开会，除说明这次进攻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努力争取胜利等一些话以外，并赋予各部队以任务：“（一）第三师、第九师、炮兵团（欠一营）及通讯兵团的一个营，统归第九师师长李延年指挥，担任进攻白衣洋岭共军主阵地的任务；（二）第二十六师主力集结新泉附近，担任左侧的警戒，并派出小部队向新泉以西一带进行威力搜索；（三）第十师担任新泉、龙岩间地区的戒备，防止共军破坏我交通和运输；（四）第八十三师主力集结于连城，担任右侧的警戒，并派一部向连城以西地区进行活动；（五）福建省保安第十团接替第十师所遗上杭、永定的防务，右与三十六师联系，防止共军窜扰我侧背；（六）第八十师担任龙岩的守备，并负责维护龙岩、漳州间公路的安全。”

命令下达后，部队开始行动。第三师第八旅（旅长许永相）首先开到朋口以西的温坊（温坊在白衣洋岭山麓），就攻击准备位置。这个旅长既没有亲率干部侦察地形配置警戒，也没有严格要求各团严密警戒，如同普通行军宿营一样，随便派几个哨兵就算了。就在那天晚上，红军来了个突袭，不到两个钟头把这个旅消灭得干干净净。旅长许永相于睡梦中惊醒起来，乘黑夜只身逃脱。这一失利，给东路军以很大的震动。指挥官李延年不服气，立命他的第九师升上去，对当面红军情况也不侦察，就下令进攻。结果第九师又损失了一个团的兵力，攻势顿挫了。

蒋介石在南昌得悉第三、第九两师失利情况，极为恼怒，立电蒋鼎文将许永相扣押交军法讯办，随后枪毙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降两级（由中将降为上校），革职留任。蒋鼎文、李延年均受到严厉申斥。

蒋介石深知蒋鼎文无能，他感到纵然给予这样的处分，也未必能使蒋鼎文振作起来，挽回局势，因此仍不放心，乃派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乘飞机来闽西，名义上说是来协助蒋鼎文策划进

攻，实际上是要顾祝同来指挥东路军作战，把蒋鼎文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顾祝同到龙岩后，立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军官开会。他在会上代表蒋介石说话，主要内容有三点：“（一）第三师之所以失利，不是兵不能战，完全是因各级军官，尤其是团长以上的军官，懈怠偷安，不负责任所造成，如不严明纪律，则‘剿共’军事不堪设想。（他当场严斥李玉堂，并声言必须严办许永相，决不姑息。）（二）中央现倾全力‘剿共’，自福建事变解决后，我军处于有利态势。这次大举‘进剿’，其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存亡，大家必须抱定‘有敌尤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务期于短期内歼灭共军的主力。北路军现正以全力进攻宁都、石城，东路军应迅即击破当面的共军，进取长汀，配合北路军的作战。

（三）重新调整部署：命三十六师担任进攻白衣洋岭共军主阵地的任务；命第十师即推进到新泉、中屋村一带；命第九师主力集结于朋口以西地区，以一部在三十六师的右翼协助进攻；命第八十二师集结于连城、朋口间，担任右翼的警戒，并派一部向连城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命第三师暂调到中屋村一带整理。”此外对炮兵、对空联络、后勤、通讯等，均作了一些具体指示。

我回到新泉师部后，即召集各旅团长开会，传达龙岩会议的决定，并讨论了进攻时应注意事项和补给等问题。翌日我部即开赴温坊集结。九月二十五日，我师开到温坊后，各部队立即占领附近各高地构筑工事，严密戒备，以免重蹈第三师的覆辙。九月二十六日，我率各旅团营长侦察白衣洋岭红军主阵地带的情况。

白衣洋岭是一条自南向北山峦重叠的高山，形势险要，是通往长汀的一条主要道路。越过这带高山，再向西去，地势就没有这样险要了。红军利用这线山岭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在最高的几个山峰上构成主阵地带，阵地布置相当周到，大小据点组成交叉火力。主要据点是在几个山顶上，挖下深沟，并用大木头盖成掩体，又在上面铺一层二、三尺厚的土，最上层伪装着草皮或树

枝。阵地内各主要据点间，挖有交通壕。阵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鹿砦或竹签作为障碍物。主阵地带前面的一线高地，比最高山峰要低一些，也筑有较为简单的工事，似为红军的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这是我们侦察情况时使用炮兵用的观测镜所窥见的大概情形。在几个小时里，我们很少看到红军士兵的活动，说明他们隐蔽得很好。

我们侦察完毕回到师部后，随即开会讨论进攻方法和兵力部署等问题，主要是步炮兵的密切协同及要求空军的支援。因为大家认为红军阵地工事相当坚固，单靠师内拥有的迫击炮是难以摧毁的。除当场和炮兵第五团的团、营长作了详细的具体协商外，我还以电话向在龙岩的顾祝同汇报侦察所得情况，并提出请派空军支援；同时用密语告诉他，我们预定攻击开始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时。顾答应即电南昌行营核派飞机助战（当时蒋空军飞机大部分集中在南昌，在闽西并无空军基地）。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大家进行了相当紧张的准备工作，来完成一切必要的部署。二十七日上午六时，担任攻击任务的一〇八旅（旅长钟彬）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一〇六旅（旅长李良荣）的二一二团担任右翼的警戒，并派出一个营协助攻击；二一一团为总预备队，位置于攻击部队的左后方。七时，炮兵开始向红军的警戒阵地射击。约莫二十分钟后，一〇八旅部队即开始前进。红军警戒部队稍事抵抗后，即撤到主阵地去了，我部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夺取了警戒阵地。我组织了一个指挥所，随同一〇八旅的二一六团前进。该团担任进攻的目标，是红军主阵地的一个最主要的堡垒。二一五团担任进攻的目标，是红军主阵地右翼的一个稍为突出的山峰。我随二一六团部队进至离红军主阵地前约五、六百公尺处的一个山坡，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见红军的堡垒不仅工事坚固，而且地形陡险，仰攻不易。而左侧的那个山峰，攀登较易，如能占领那个山峰，即可以之作为基点，沿着山岭向前攻击，绕攻红军主要堡垒的侧背。到那时，正面部队再发起冲击，



奏效可能较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参谋长向贤矩和二一六团团长胡家骥，他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当即以电话召旅长钟彬及二一五团团长刘英来我处，经过就地观察和研商后，决定以主力向左侧山峰（即红军主阵地右翼稍突出的那个山峰）攻击，同时正面亦以有力的一部进攻，借以牵制红军的兵力。我又命预备队二一一团在二一五团后跟进，必要时归旅长钟彬指挥，适时投入战斗。

上午九时半，炮兵开始以主火力轰击红军阵地右翼的突出地带，以一部火力向正面的主峰堡垒射击。空军在上午八时有战斗机六架由南昌飞来，在红军阵地上投掷了一些轻磅炸弹，到九时半左右，又来了九架，内中有六架是轻轰炸机，三架是战斗机。轻轰炸机在阵地上投下了破坏力较大的炸弹，对摧毁红军阵地工事起了一定作用。战斗机则在上空监视红军的行动。在飞机和大炮轰击后，步兵即开始冲锋。向正面主峰堡垒进攻的二一六团的一个营，到达堡垒边，遭受红军的炽盛火力和从阵地内扔下的手榴弹，伤亡甚大，暂时中止攻击。向左翼山峰进攻的二一五团，在强有力的火力掩护下，利用红军阵地工事被摧毁的瞬间，约有一个多营冲入了堡垒，占领了那个山峰。但不到十分钟，红军乘该部立足未稳之际，立即进行反攻，以强烈的逆袭赶走了侵占山顶的二一五团部队，重行保有那个山峰。我目睹这种形势的危险，立即命令二一五团团长刘英亲率所部冲锋，务要迅即夺取那山峰。这样，就随即造成了在这山峰上一场十分激烈的争夺战，喊杀之声响彻云霄，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亦很猛烈。红军由于伤亡大，人数不够，终于被迫退出，二一五团遂又占领了那个山峰。这大约是上午十一时左右的情况。

一〇八旅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准备发起新的进攻时，第三次来到上空（这次共来了六架战斗机）的一架战斗机，在我的指挥所附近投下一个布口袋。拾起来打开一看，在一张纸上写着：红军大部队约有二、三千人，正从南面山谷里向我左翼运动，请严密注意。署

名“毛邦初”三个字(毛邦初当时是蒋军的空军指挥官)。我得到这一通知后,即以电话告知钟彬,并命预备队二一二团向前移动,统归钟彬指挥,来应付红军向我左翼包围攻击的企图。同时命在右翼的二一二团,除派一部在右翼警戒外,亦调到师指挥所附近集结,以防万一。大约到十一点半左右,向我左翼迂回攻击的红军,以主力指向二一五团攻占的山头,以一部攻击更左翼的一些山头,来势甚猛。我当命炮兵集中火力支援左翼部队的作战,同时命二一六团向正面阵地猛攻,借以牵制红军兵力。在一个多钟头里,左翼一带高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有的山头彼此间反复冲击达五、六次。由于我部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加上又有空军的支援,红军遭受相当大的伤亡,攻势顿挫,便迅即撤走了。我部打退了红军在左翼的进攻,部队官兵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大大提高了。我们随即继续进攻红军主阵地,在飞机和炮火的猛烈轰炸下,红军阵地工事多被摧毁,而进攻兵力亦更为优势和集中,到下午二点多钟,二一六团在正面,二一五团在左翼,均突入了红军主阵地。红军知道难以再守,主力便迅速向西撤走,留置一部分于白衣洋岭西边一带高地,监视和阻滞我师的行动。下午三时左右,我率师指挥所人员来到白衣洋岭最高峰。当我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时,突然从西面山坡的丛林里,由轻机枪射过来一排子弹,我和一个卫士均受伤了。当命部队继续向前搜索。我由于伤势颇重,不能留在前方指挥,将职务交参谋长向贤矩代理,便转到后方疗养去了。

## 瞿秋白被害经过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和红军作战负伤后,被送医院治疗,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才回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

我回来时,瞿秋白先生已经被捕,从上杭送到长汀十多天了,这里将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先生被捕到就义的情况记叙如下: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但仍留下了一部分力量于赣闽边区，继续从事游击战争，以牵制蒋军兵力。三十六师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继白衣洋岭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的。一九三五年二月间第十师他调，汤恩伯以纵队司令的名义指挥第四、第八十九两师及另外的一个师加上别动总队及江西保安团等，到了瑞金、会昌一带。约在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汤恩伯打电报通知三十六师，说有共军约七、八千人，归项英、陈毅统率，在瑞金、会昌、长汀间地区活动。说他奉委员长（蒋介石）命令，负责迅速肃清这股共军。他们到了那里不久，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了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还有空军的帮助，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和反击，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陈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依据当时的情况推断，红军大约主要是分成三部分分头突围。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〇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红军的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早先向上杭方面去了，在这三百多人中，有瞿秋白先生在内。钟彬旅长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根据这个情报急电报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当时在上杭并无正规部队，只驻有福建省政府所属的保安第十四团，团长钟绍葵，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在此之前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多人，已被该保安团所截俘，内中有二十余人，经该团查明是红军干部，寄押于上杭县政府的监狱里，瞿秋白先生当时化名林琪祥，说是在红军部队中做文书工作的，即在其中。保安团接到蒋鼎文的电令后，一则感到他们的责任重大，一则觉得如能将瞿秋白清查出来，可以邀功邀赏，所以，十分卖力气来进行这一工作。他们先将所俘红军士兵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先生是在那二十多人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两次，……仍然

没有人供认，遂使用严刑拷打和“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的双管齐下的办法，结果其中有一个人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变节了，供出了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四团查出了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听说该团派了一个连押送，三十六师还派了队伍到中途去接。

我经过很长时间的回忆，对于秋白先生被捕的日期和送到长汀的日期，始终难以明确，送到长汀的日期，可能为五月上旬或中旬。

三十六师司令部住在长汀靠西头路南的一栋中等地主所谓缙绅之家。进大门有一个小天井，靠左手边有一间厢房，长约一丈一尺左右，宽约七、八尺，门向南，窗子向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床，安置在东边靠着墙，一张书桌安置在西边靠着窗户，一个洗脸架安置在北头，还有一把木椅和一条板凳，秋白先生自到长汀那天起到就义止，就是住在这间屋子里。在瞿先生正对面的一间厢房，住着一个副官蒋昌宜和几名警卫，他们负着双重任务——监视和照料生活。中间是堂屋，不怎么大，空无所有。进里面就是所谓正房，左右各一间，两边还有几间厢房，我和向贤矩及秘书、侍从副官、卫士等住在这里。其他各处（如参谋处、副官处等）则住在后院和附近的一些民房里。

秋白先生原来穿什么衣服，我不清楚，我见到他时，他是穿着一件灰色夹布长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

秋白先生每天除了刻图章或有时和人谈话以外，大部分时间便是写写感想和作诗，有时也谈谈古文和唐诗（当时在长汀，也找不到其他的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瞿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在大约是一百张（或六十张）十行纸订成的一个本子上，用毛笔写了一长篇《多余的话》和一些诗词。这个本子，他托向贤矩代为寄交某人，秋白先生就义后，向贤矩曾交给我看，我只是粗枝大叶地看了一遍就交还他，没有认真研究，所以对于内容记不起来了。

据秋白先生说，他因健康情况不大好，所以没有随红军主力部队北上，原打算转到上海去疗养，不料在上杭被捕了。他在长汀一个多月，没有生过大病，但常有些咳嗽及头晕的情形。他身躯颇为单弱，脸部显得消瘦。

关于秋白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情况，向贤矩和他接触较多，可能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得多些，可惜向贤矩去世了。

我和秋白先生只谈过一次话，由于自己当时的反动立场，对真理和是非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彼此间意见是完全对立的。记得我回到长汀后的第三天，我到秋白先生室内去看他，先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他的身体情况后，转而谈到政治问题。

我说：“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在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成为小地主，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秋白先生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一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情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

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或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秋白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许多的话，我记不完全，只能概述当时他所说的大意。

接着秋白先生又说：“宋生先，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有人耕种呢？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对我们施行严密的封锁，苏区的经济完全靠发展生产来自给，在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的田地并无荒废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所以显得荒凉，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至于一些房舍被毁坏，恐怕大部分是由于战争所造成。”

我和他进行了争论，争论的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最后我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根据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的时间，江西省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慄，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秋白先生对江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表示怀疑，认为是有意夸大数字，借此来诬蔑共产党。同时秋白先生又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死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是要由国民党负责，因为国民党先后调集了百万以上的军队来围攻我们。

以上是我和秋白先生谈话的大概情形。

蒋介石得悉拘捕了瞿秋白的消息后，即令国民党中统局派了两个人（编者：即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陈建中）由南京赶来长汀和秋白先生谈话，想劝秋白先生背叛共产党，并交出共产党内部的组织情况，但一点没有达到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我接到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本师有调动的消息。瞿秋白的问题如何处理是需要及早解决的。因此，我分别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和蒋鼎文，请示处理办法。我好像记得发给蒋鼎文的电报里，还谈到如送去漳州，怎样解决路上的安全问题。以后听说蒋鼎文也有电报向蒋介石请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均是“限即刻到”的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当天晚上我和向贤矩及政训处长蒋先启、特务连长余冰研究了执行这个命令的具体措施。商定：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中山公园枪决；在司令部通往中山公园的路上及中山公园的周围，均由警卫连严密警戒，禁止老百姓观看；十八日晨早餐后，由向贤矩将蒋介石的电令交瞿秋白看；由蒋先启随伴瞿秋白前往中山公园，并负责监督执行。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向贤矩进入秋白先生室内，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据向贤矩告诉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没有一点变化，若无其事。九时许，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又感动，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

由司令部走到中山公园，只有六、七百步，这个公园占地不大，环绕一圈，不过两里多，周围有些树木，中间有一小运动场，靠东边有一个用土砖砌成的讲台，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建筑，亭台楼阁的点缀，这里是一点也没有的。

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同下，来到公园，在那座讲台的前面停下来，当时除周围担任警戒的士兵外，在场的仅有特务连官兵三十余人。

执行后，蒋先启回到司令部向我和向贤矩报告执行情况，说秋白先生到了公园后，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讲演，主要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等语（大意如此）。秋白先生讲完后，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据蒋先启说，当秋白先生喊完口号后，他便命令士兵开枪，结束了秋白先生的生命，时间约在十时左右。

将秋白先生处决后，我叫人买了一口棺材装殓，即埋葬在中山公园的旁侧。

在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将处决瞿秋白的情形，分电向蒋介石、蒋鼎文报告。

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 西安事变之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西安事变，那时，我任国民政府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部队驻在苏州一带，构筑国防工事，得悉这个消息，感到惶惶不安，蒋介石是否会丧失生命？今后政治局势的演变如何？如果蒋介石不能再出来，南京的军权必



然落在何应钦的手里，他能否不记旧帐？因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我曾坚决要求开往上海抗日，并鼓动部属向何应钦请愿，在言辞上予以难堪。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着。

十二月十三日晚，何应钦来电话叫我马上到南京去。十四日我乘早班快车于十二点多钟到了下关，立即往鼓楼斗鸡闸何公馆，何和几个高级军事幕僚在吃午饭，见我来了，离座和我握手，并让我一起吃饭，态度很和蔼。饭后他带我到里面会客室说：“这次西安事变，名义上是张学良、杨虎城干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策动的，我们和共产党斗争过多年，共产党人的厉害你们是知道的。委员长这次被扣，能否保全生命、能不能回来，很成问题。中央昨天开会，对张、杨的叛变，已经决定讨伐，并命我负责指挥军队。黄埔军校系统的军队，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支柱，只要你们同学——尤其是带兵的将领，能一致团结起来，是可以应付这个局面的。”又说：“中央已拟好讨伐计划，等一会儿由王厅长（参谋本部厅长王伦）把大概的情形对你讲一讲。你的部队应立即由苏州出发，经津浦、陇海路到华阴、华县一带集结待命。我已经要墨三（顾祝同）、经扶（刘峙）到洛阳负责指挥，你路过洛阳时，可去看他们。”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自闻西安事变，我感到很难过，怕内战扩大，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多可乘的机会。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是可恨的，我拥护中央的决定，一切听从老师（何是我在黄埔军校一期时的总教官）的指挥。可是我有点担心，过去在江西和共军打了将近十年，都不能消灭他们，现在如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都倒向共产党方面，他们的力量更壮大了，恐怕很难在短期内消灭他们。同时，如果打起来，会不会危及委员长的生命，也是值得考虑的。”我表示拥护何的态度，不用说，何是很高兴的。但我后面说的这段话，并不符合何的心愿。他想了一下就说：“你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我们第一步是部署兵力对西安形成包围形势，看情况的发展再作决定。你赶快回去，此间已通知铁路运输司令部迅速调拨车辆装运你的

部队，你可和他们直接接洽。”我辞出后，和王伦厅长谈了一会儿所谓“讨伐计划”的概要，也就是军事包围西安的计划，部署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

一、以董钊的第二十八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樊崧甫兼的第七十九师及炮兵第一、第五两团的主力和一个工兵团为骨干，统归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指挥。沿陇海路两侧从正面直攻西安。

二、以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归李默庵指挥，由潼关开往洛南，进取兰田。

三、命驻天水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

四、命驻汉中的王耀武的第五十一师取道子午谷，进出西安以南地区。

五、命驻宁夏吴忠堡附近的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地区前进。

六、命郑洞国的第二师、李必蕃的第二十三师为沿陇海铁路进攻的总预备队，集结于潼关附近。

七、空军主力集中洛阳，待命轰炸西安，并协助铁路正面部队的作战。

还有其他的一些部队，我记不清楚了。

我离开何公馆后即到运输司令部，他们告诉我，已接到何的命令，正积极调拨列车，准于今晚至明日上午先后集中苏州开始运送。我当天下午赶回苏州，部署部队出发。十五日，三十六师全部分乘八个列车从苏州开出，速度超过了特别快车，于十六日晚通过洛阳向西疾驶。我到洛阳下车，往见顾祝同、刘峙，得知下列情况：

一、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派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

二、国民政府已颁布明令讨伐张学良。

三、中央派于右任宣慰西北军，即日来潼关，对西北军进行分化工作。

四、冯钦哉所部驻在渭河以北的大荔一带，不愿附和 张、杨，正派人前往联络。

五、据空军侦察，张学良的部队，正在渭南以东的赤水镇一带布防，并构筑工事。又空军正在渭南投弹。

六、根据讨逆军总部计划，我方陇海铁路线正面部队，大体可于二十日左右集结全毕。

刘峙、顾祝同指示：三十六师开到华县集结后，先派人侦察张学良部布防情况。同时，我还会见了空军司令毛邦初，铁路运输司令钱宗泽等人。十八日我到华阴，会见樊崧甫，他告诉我，刚接洛阳电话，蒋鼎文已由西安乘飞机到了洛阳，即转南京，携有委员长亲笔信，看来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以后又获得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等去西安的消息。在蒋介石未离西安以前，部队主要的活动是练习爬梯，因为赤水一带是断壁陡坡，不能不作攻击的准备。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由军委会派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等组织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又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表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这些措施，引起东北军及杨虎城部和陕、甘两省广大群众的愤慨和反对。蒋介石命何应钦继续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压力，顾祝同于一月间来到潼关，与东北军及杨虎城的代表多次磋商，直至二月初才达成协议。顾祝同面示我率三十六师首先开入西安，在不伤害东北军的感情下，逐步地和缓地接替西安防务。我遵照顾祝同的指示，率部于二月七日到达西安东门外驻扎。西安的城防由东北军刘多荃的一〇五师担任。西安行营设 在南院门，本师负有保卫行营的责任，我于八日上午访晤刘多荃，并提出初步要求：1. 派步兵一营到南院门行营附近担任警卫；2. 由本师接替东门城防，因部队都驻在东门外，常要进城采买，恐易和东北军发

生误会。刘多荃同意了。是日下午我指派二一六团第三营附小炮一连开往南院门，并亲自和团长胡家骥、营长顾心衡详细侦察行营周围道路，配置警戒。九日上午接替了东门城防。因顾祝同日内来西安，我又向刘多荃要求接替了北门的城防。十日或十一日顾祝同由潼关到西安，同来的除顾的参谋长赵启霖等人外，还有黄杰和毛邦初。黄杰原任第二师师长，是顾祝同多年的部属，曾参加古北口抗战，驻北平两年多，与东北军各将领多熟识。顾嘱咐黄杰、毛邦初和我三人，多和东北军联络感情。以后我们常在一个东北人（忘其姓名）开设的一家公司的楼上或川陕公司总经理周文达（湖北人）家里打牌，有时也到陕西省银行总经理李维城（湖南人）那里去玩，酬酢无虚夕，凡达一个月，对拉拢东北军上层分子，起过一些作用。

二月中旬，西安城防统由本师接替。司令部由东门外移驻西大街。阮肇昌的五十七师亦开到西门外至咸阳道上驻防。原来入陕的部队，如桂永清的教导总队、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樊崧甫的第七十九师等，大约是二月下旬开始东运，离开陕境。

本师入城后不久，顾祝同命令组织一个“西安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派我兼处长，警察局长马志超、宪兵团长（忘其姓名）为副处长，负责维持城内外治安。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撤销“军警宪联合办事处”，成立“西安警备司令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我兼西安警备司令，马志超为副司令，直至八一三本师开往上海抗战时为止。这一期间，大家所关心的多半是抗日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叶剑英将军以及曾到过西安的陈赓将军等人见过面，谈论的主要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问题。

二月下旬或三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来到西安，企图破坏国共的合作，没有通过我竟直接指示三

十六师政工处长蒋先启在西安的市中心——钟楼上悬挂一幅“统一战线是共产党死灰复燃的企图”的白布大字标语。另外还张贴了一些刺激东北军和杨虎城部队感情的标语。第二天或第三天，顾祝同找我去问这些标语是谁叫张贴的？问我见过没有？我说：

“我根本不知道，也未见过。”他叫我立即去查明后告诉他。我找蒋先启来询问，他把过程对我说了。我责备他，这样重大的事件，为什么不先报告我呢？随后我到行营见顾祝同报告事情经过，顾嘱我立即派人将那些标语撤下，并说以后贴标语统由行营第二厅负责。顾即找贺衷寒去谈话，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过争论。

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兼军事训练班主任康泽也来到西安。他曾告诉我，共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他向顾祝同推荐刘伯龙、李秉中、任觉五三人去担任这三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问我的意见怎样？我说：“顾主任和周恩来先生谈判的内容我不太清楚，不过我想这样做，中共方面恐怕是不会接受的。”

在这段期间，我还耳闻了这样几件事：

一、西安事变时，胡宗南是第一军军长，所部驻在甘肃天水一带。毛炳文是第八军军长，下辖陶峙岳的第八师，李英的第二十四师，驻在天水以北地区。胡宗南曾向毛炳文提议，两军联合起来向西安前进，毛不同意，力主慎重，胡宗南大为不快。西安事变后，胡向蒋介石报告，说西安事变时，毛炳文按兵不动，态度暧昧。蒋听了胡的谗言，认为毛炳文不忠实。从此，毛不再被重用，以后连个军长都保不住了！

二、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是西北“剿总”的政训处长，他为了蒋介石生命的安全，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他曾向南京广播。以后陈立夫将曾扩情的广播记录，送给蒋看，蒋大怒，批了“无耻之极”四字，将曾扩情撤职交军法审办，曾被军政部军法司看管了半年，才被保释出来。

三、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接掌兵权，贺衷寒为取得何的信任，将复兴社内部组织情况及社员名册，统统向何报告，蒋介石出来后，得悉这件事，大发雷霆，说：“我还没有死，就把我出卖了，混蛋的家伙”！不久，贺衷寒被免去了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在复兴社内部亦削弱了贺的权力。这个在一九二五年在黄埔军校就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标榜反共的急先锋，一直是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的，至此他就失宠了。

## 蒋介石被迫抗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蒋介石命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率部退入关内。几天之内，就丧失了东北广大国土。全国人民愤慨万分，到处举行游行示威，纷纷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一面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共同抗日，一面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组织多种救亡运动。蒋介石却于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人会上发表演说，公然说要采取“逆来顺受态度”。就在同一天，还发表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命令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对国民也一再告诫，“务须坚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他的两个担任重要职务的亲信何应钦、张群，是有名的亲日派，逢人便说：“若同日本对抗，顶多三天就要亡国。”这样的话，我听他们讲过多次，蒋介石政府对群众的抗日运动，实行严厉的镇压，许多爱国同胞遭到逮捕或屠杀。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则调动其全部力量，全力进行“围剿”，施行他那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控制东北后，便着着向华北进逼。由于蒋介石的步步退让政策，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到一九三六年又同意日本提出“华北特殊化”的方案。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原属西北军系统）为首的“冀察

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方立即提出要占有华北全部主权的要求，首先指示其在政务委员会当委员的汉奸潘毓桂、张壁等人，提出成立“华北自治政府”的方案，遭到宋哲元的拒绝。日寇看此计一时行不通，就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在经济上进行掠夺的要求，例如：由日方负责修筑津石（由天津到石家庄）铁路、开发龙烟铁矿、修改海关税则等等。宋哲元既不敢明确地拒绝日寇的要求，又不敢悍然出卖国家的主权，乃采取拖延政策。宋哲元之所以如此，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分不开的。当时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组织对二十九军官兵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发了这个部队的爱国热情，绝大多数官兵都不甘心当亡国奴，对日寇的侵略欺压，深为愤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伪称要到卢沟桥演习，所有枪炮均配备了弹药，到夜间枪炮声大作，日军开始进攻宛平县城，驻守该地的吉星文团奋起抗击，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于七月八日向全国发出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出路。主张全国同胞和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并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催促他们实行全体总动员。各地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抗战，请缨杀敌。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处在这样严重的关头，仍然反对抗日，只希望以和平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派熊斌到北平，与宋哲元会商和平解决办法，随后又两次召见宋哲元的代表，面授机宜。自七月十一日起，与日方进行谈判，到十九日正式签字，协议内容大致如下：（一）撤换阻碍中日国交的官员；（二）彻底镇压共产党；（三）取缔排日的各团体及各种活动。中国方面代表签字的为张自忠（当时是宋哲元下面的一个师长兼天津市长），日方代表签字的为桥本群。宋哲元在蒋介石授意下与日方签订的卖国条约，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央得报后，察其内容与我（蒋介石）既定方针，

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七月二十七日外交部发言人谈话）双方签字后，七月二十二日在北平查禁了抗日刊物六十多种，并明令禁止抗日活动。上海等地出版刊物不准用“日本鬼子”字样。蒋介石并继续派兵围攻湘鄂赣边区、豫鄂皖边区、闽粤边区要求抗日的红军。蒋介石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吐出的表示抗战意思的话。这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所逼出来的，绝非蒋介石的本意。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天津、北平以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又开始攻击上海，蒋介石在一次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决不是不欲与日本和平，然而日本的要求是有限度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是要满洲的，但是给以满洲后，又要华北，我们给了华北，现在日本又要上海和广东。日本的要求如果只限于满洲和华北，则我能够负责与日本提携，然而日本的要求，彻头彻尾是有限度的。”蒋介石这时才接受全国人民的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称抗战。但是，蒋介石根本没有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他的抗战，决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